

周恩来巧赠外宾“蘑菇云”照片当国礼

□ 孟 红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照片发挥更大的作用。1964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为了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访问。早在烽火岁月里，他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第一个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向世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个为了人民利益而勇于流血牺牲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并与他们（尤其是周恩来）结下了深厚友谊。斯诺对周恩来再熟悉不过了。他最难忘的就是当年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到陕北去找红军，在延安，斯诺见到的第一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当时听到周恩来用英语欢迎他，斯诺十分吃惊。他想不到眼前的周恩来英姿勃勃、温文尔雅，与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的形象完全是天壤之别。

这次斯诺到北京，周恩来会见了 他，他非常高兴。针对斯诺此次访问的计划，周恩来建议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

当斯诺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采访到负责这次核爆炸的具体官员的要求

时，周恩来毫不避讳、实话实说：“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

的确，周恩来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原子弹的第一手材料。颇有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斯诺听完周恩来这两句话，两眼闪出兴奋的光。他马上问道：“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做背景材料呢，还是可以发表？”

自从1936年相识以来，周恩来与斯诺达成了一种默契，每次谈话后，斯诺总要问明，他们的谈话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哪些内容不宜立即公布。有时，斯诺还把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送交周恩来审定，他完全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也信任斯诺，谈话的内容总是很轻松。这常常使得斯诺可以获知一些其他驻华外国记者难以得到的“内部消息”。那些外国驻华记者由此对斯诺羡慕不已，经常向他打听“内部消息”。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又故意逗笑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高兴地笑了。这样的特号独家新闻，斯诺太知道它的时效性和轰动性及重大意义了。

“我今天和你谈话只能1个小时了，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谈。可是我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校发的。”孩子回答得无心，可周恩来却听得有意。

周恩来问：“你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孩子说。“噢，老吃吗？”周恩来继续发问。“老吃，有的同学都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显然，孩子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几天后，是个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来难得有空，就要了车直奔育英学校而去。校长得知总理来了，立刻迎了出来。

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校长汇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

周恩来等他讲完，随即说出了从秘书的孩子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

任弼时提出忠告。在西柏坡，被称为“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等职务，在那个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期，任弼时的工作十分繁忙，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在百忙之中，任弼时从没有忘记子女的教育问题，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

1948年，任弼时的小儿子任远远才六七岁，从延安到西柏坡时，带来一辆小自行车，虽已很旧，孩子却十分爱惜，每次骑后都擦一擦。

一天，远远要他的姐姐远志领着他到院外的打谷场练习骑车。天真活泼的远远骑上自行车绕场转圈，一阵快，一阵慢，骑得十分开心。两人玩了一会

斯诺很乐意地连连点头说：“OK！”

周恩来举杯向斯诺示意：“这次你回去，美国国务院一定要你向他们报告。”

“不一定，可能又要在4年以后。”斯诺这样说是根据前次的经历。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美国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只与他漫不经心地谈了12分钟。4年以后，新的国务院负责人才又重新找斯诺去谈他在中国的访问印象。

“这次不会，时代变了。”周恩来肯定地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后，就改了口气，现在又说这颗原子弹可能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还要先进。”

斯诺说：“我过去去保安，在窑洞里访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今天爆炸原子弹。你们都会打扑克吗？我今天正在想，你们手中拿了一手好牌。你们手中有一张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张Q（指来华访问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张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的董事长凯瑟克），并且又向桌子上打出了一张A（指原子弹）。”

周恩来亲手把中国12张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交给了他，要他不要等了，今天晚上就回瑞士，在中立国家的中立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

第二天，倍感荣幸的斯诺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周恩来的嘱托回到了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张照片。

随即，西方的各种报纸纷纷转载这些照片和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重大事件，就这样再次震动了全世界。

（摘自2018年第5期《党史文苑》）



北京育英学校的往事

□ 车淑芳

毛泽东亲题“好好学习”。在育英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严禁炫耀家长的荣誉地位。老师从不问学生家长的名字，学生之间也从不打听父母的情况，不互相攀比。育英学校的孩子们从小就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不攀比父母职位的高低。

“当时作为中直机关的干部子弟小学，育英的学生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有各部门负责同志的孩子，也有一般干部的孩子，但在育英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学生。校长、老师比父母还要操心，绝不因家长的官大而偏向什么人。同学间就像兄弟姐妹，大伙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一样地受老师的关心、照顾和教育。同学间相互直呼其名，不加姓，大多不知道谁的爸爸妈妈是谁，当然更不知道家长们的职务，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姓什么。就是知道家长干什么，也没有人炫耀，更没有攀比。听说实行军衔制后有的学校学生比爸爸星和杠的多少，育英的学生们对此嗤之以鼻。在同学当中，威信高的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听说谁的家长官大就在同学中称王称霸的。”第5届学生乔丹林回忆时动情地说。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育英学校的学生家长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学校和孩子们表示节日的祝贺。当时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在育英学校上学，高尔俭老师担任李讷的班主任。高老师清晰地记得，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学校号召各个班级和课外活动小组以集体的名义做些什么送给学校，以表示对自己节日的祝贺。高老师的班是全校的最高班（小学五年级），当然不甘落于人后。于是，高老师在班上作动员：为了迎接国际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要做件礼物送给学校，请同学们动动脑筋，送点儿新鲜的，不同凡响的，但不能用钱买。这一动员，同学们就开始纷纷想办法，有的要刺绣，有的要画画。高老师引导说，

星期天你们回家时（当时所有学生皆寄宿在学校，只有周日回家）也可以请家长帮帮忙呀！这么一提醒，同学们思路一下子开阔了。

就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李讷拿来了一张宣纸，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八个字。李讷说：“昨天我央求爸爸给写几个字，爸爸写了‘好好学习’四个毛笔字。但不小心被水滴弄了水印，于是爸爸又在这个‘好好学习’的左侧偏下写了‘好好学习’四个小字。”

同学们看到毛主席的“好好学习”题词，激动得热烈鼓掌。高老师捧着题词，带同学们到学校木工教室，请潘仲贤老师指导，做了个木框，并安上玻璃，小心地把“好好学习”的题词镶嵌于内。然后，全班同学排队送到校长办公室，交由韩作黎校长亲自妥善保存。

不久，韩校长把它挂在办公室入口对面的墙上。只要一进楼门，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这几个字时时刻刻鼓舞激励着师生们不断奋进！

后来，学校又把毛主席的题词镌刻在一进校门的影壁上，时刻提醒同学们好好学习，提醒教师要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如今，“好好学习”已成为育英学校的校训，内涵也更加丰富。

周恩来亲赴学校。1952年冬，周恩来的一名秘书把自己在育英学校读书的孩子，带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看到孩子时，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是呢料制作的。

周恩来问孩子：“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回答说：“不是买的，是学

校发的。”孩子回答得无心，可周恩来却听得有意。

周恩来问：“你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孩子说。“噢，老吃吗？”周恩来继续发问。“老吃，有的同学都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显然，孩子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几天后，是个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来难得有空，就要了车直奔育英学校而去。校长得知总理来了，立刻迎了出来。

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校长汇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

周恩来等他讲完，随即说出了从秘书的孩子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

任弼时提出忠告。在西柏坡，被称为“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等职务，在那个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期，任弼时的工作十分繁忙，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在百忙之中，任弼时从没有忘记子女的教育问题，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

1948年，任弼时的小儿子任远远才六七岁，从延安到西柏坡时，带来一辆小自行车，虽已很旧，孩子却十分爱惜，每次骑后都擦一擦。

一天，远远要他的姐姐远志领着他到院外的打谷场练习骑车。天真活泼的远远骑上自行车绕场转圈，一阵快，一阵慢，骑得十分开心。两人玩了一会

1944年7月24日，我国著名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邹韬奋在上海不幸病逝，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对邹韬奋一生斗争历程的最高评价。

邹韬奋，江西余江人，1895年生于福建永安。早年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南洋公学，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21年毕业后，邹韬奋受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这些经历，成为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日军的残暴、人民的痛苦和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无能使他骤然觉醒。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战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邹韬奋任总经理。短时间内，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达56家之多，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后来，他考察了英、美、法、苏等国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考察学习，邹韬奋思想得到淬炼，并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性与必要性。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祖国。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他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纪录，并成功鼓舞了成千上万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在此期间，邹韬奋还承担起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然而，他的活动很快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和《永生》杂志也先后遭到查禁并被迫停刊。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与沈钧儒等7人被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获释。重获自由的他即刻投入抗战的洪流之中，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三地创办《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引导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走



为抗日救亡奋斗不息

□ 王林育

上革命道路。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邹韬奋的迫害，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他继续积极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香港沦陷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先后转移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其间，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但党组织因考虑到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对党和革命事业更为有利而没有同意。

1944年7月，韬奋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再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合格，请追认入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在致其家属的唁电中称他为“吾党的光荣”，“其精神将长在人世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摘自2021年第2期《党建》）

变化。

第一次是在1953年。朱德非常关爱少年儿童，尽管他的孙辈都不在育英学校上学，他仍曾多次来育英视察、听课。在育英的新校园竣工落成之际，名誉校长杨尚昆邀请朱德来学校参观并为学校题词。后来，学校将朱德的题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镌刻在校门内的影壁墙上，这形成了新校园中独特的一景，也见证了育英学校第一次建设高潮结束，正式成为一所美丽的花园式学校。

第二次是在1978年。樊明德校长1978年到任育英学校，重建影壁成为他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的重要举措之一。影壁则见证了育英学校的再次腾飞。1980年开始并持续了20多年的“五四”学制改革实验，曾使得育英学校领全国课程改革之先河。影壁上镌刻的毛主席给育英学校的题词“好好学习”，再次激励育英学子发愤图强。

第三次是在2014年。于会祥校长决定，把影壁作为育英学校第三次校园环境建设高潮的重要项目——校史广场的建筑之一，使影壁再次复建。它见证着育英学校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踏上新的征程。

一代代的儿童长大了，一届届的育英学子成才了，这所学校将永远这样宁静、沉稳地矗立下去。它在时光中坚守了初心、见证了真情，也践行了教育的真义。它将永远美丽，也将继续为社会培养文明、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摘自2021年第11期《党史博览》，原标题为《你所不知道的北京育英学校》）

